

别求新声

汪介之教授讲比较文学及中俄文学交流

汪介之
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王向远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王向远 主编



汪介之教授讲比较文学及中俄文学交流

汪介之 著

别求新声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求新声 / 汪介之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 王向远主编)

ISBN 978-7-5117-2170-9

I. ①别… II. ①汪…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俄罗斯 IV. ①I206 ②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1679 号

别求新声

出 版 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邓 彤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2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6 千字

印 张: 25.2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作者简介

汪介之(1952—),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外文学关系、俄罗斯文学研究,已出版《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流亡者的乡愁: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述评》、《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20年》、《俄罗斯现代文学史》等专著10部,发表论文100余篇。目前正在研究的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诗学视域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起步发展，到现在为止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已经有了丰厚的知识产出和思想建树。它的异军突起，是当代中国一道引人瞩目的学术文化景观，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鲜明印证，也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十多年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史已经表明，要在人文研究及文学研究中建立世界观念和视野，要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要把外国文学放在中国文化立场上加以审视和阐发，要连接中外文学，要打通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壁垒，要把细致微观的实证研究与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相结合，那必然会走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在这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比较文学”是学术观念、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世界文学”则是学科资源与研究视野。它在贯中外、跨文化、通古今、越科界的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上的优势，使其无可替代地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中最有时代性、最有包容性、最有创新性的高端学科之一。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不仅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等方面生产了大量的新知识，而且逐步建立了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理论普适性的学科理论系统，逐步完善了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等分支学科，在学术成果的质与量

较文学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而且，不同作者及著作之间也可以相互显彰、相互映照、相互补充，读者也可以在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在参读和比照中领略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和世界文学，得窥比较文学殿堂之门径。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资助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支持，编者和作者深表谢意！

愿“讲堂”满座，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事业更加繁荣！

王向远

2014年4月20日

上已居世界各国之首，还全面进入了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从而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和中心，代表着世界比较文学兼收并蓄、超越学派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收在这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作者，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上，是继季羨林、乐黛云等老一辈学者之后的第二代学人。这些作者固然只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一部分，却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现年多在四十五至六十五岁之间，从学术年龄上说大体属于中壮年，都是各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大都在1980年代后走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道，1990年代后崭露头角或脱颖而出，进入20世纪后的十几年里，更成为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有幸拥有了可以安心治学的环境，赶上了数字化、信息化的新时代。既抬头看世界，又埋头务笔耕，既坚持学术的严谨，也保持思想的活跃，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充分发挥了中国学者的学术优势和想象力、思考力、创造力，取得了与时代要求相称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是个人学术履历的证明，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份奉献，更成为新时代“国人之学”即“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二十卷，选题上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理论为主，以讲述和示范学术方法为要，涉及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基本理论、比较诗学、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及中西文学关系、世界文学总体研究等方面。各卷均按一定的范围和主题，将作者有原创性、有特色的成果收编起来，将大学讲堂搬到书本上来，以读者为听众，以写代“讲”，以言代“堂”，深入浅出，以雅化俗，汇集中国比较文学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以使五指成拳、十指合掌，形成大型丛书的规模效应，得以占书架之一角，入读者之法眼，从一个侧面展示近年来中国比

自序

1980年代初，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关于“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的精辟见解，对于刚刚开始复兴的我国比较文学研究，恰如醍醐灌顶。另一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强调的“搞比较文学研究，就是搞文学关系研究，不能脱离文本”，人们也至今记忆犹新。在前辈学者的教导与引领之下，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交流源远流长。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渗透到这些国家文化的肌体内部，成为制约其文化与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印度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却没有、也不可能导致中国文化根本上的革新与发展。只是到了20世纪初期，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发端，也是中国新文学史的起点。从历史的观点看，它标志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深刻的断裂和显著的进步。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它是以中国文学为一方、以欧美近现代文学为另一方，这两种文学之间所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交流与撞击。在这一交流、碰撞中，拥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裂变，新文学随之开始诞生。这种新文学不会萌发于

中国文学和外来文学进行对话之前，不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结构内在演变的结果而出现的，而只能是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文学格局的形成。一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学不断审视、选择、吸纳、整合外来文学，又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创造性转换、革新和超越的历史。

在全部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中，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板块，20 世纪的历史更把这种交往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成长、发展和演变的整个过程，始终伴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然而，在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不仅中俄两国的历史道路都充满着曲折与坎坷，两国文学各自的进程也同样处于动荡起伏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文学彼此之间的交流、传播、接受和影响，便远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不妨说，正是这一切交织而成的丰盈与厚重，给我们考察两国文学及其关系史，留下了无尽的空间和说不完的话题。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面对的俄罗斯文学，其本身也是一种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客观存在，一个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实体，而中国文学对它的接纳，则显示出作为接受者民族进行选择的目光。这种选择的结果，往往既表明了某种摄取侧重和价值取向，也必然有所舍弃、排拒和失落，甚而有这样那样的偏颇或变形，并且在总体上呈现出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转换的阶段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接受主体的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等“先结构”，接受者民族的现实需求及其所处的时代氛围，等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其中的现实需求则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因此，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接受与理解的俄罗斯文学，就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为客观现象存在的俄罗斯文学本身。检视这一接受过程及其偏重和遗落，正是梳理中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史、乃至整个中俄文学交流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由于俄罗斯文学自身的复杂构成以及制约文学的社会生活的动荡与时代氛围的变化，这一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实际影响，必然是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不同作用和效果。纵观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联系中俄文学的丰饶实绩，不难看出俄罗斯文学的主导精神、创作方法、体裁样式、形象系列和艺术风格诸方面，都对 中国新文学总体格局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有益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才几乎一致地把俄罗斯文学视为自己的导师和朋友。但是，庸俗社会学的泛滥，“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先后兴起，极左文学路线和文艺政策的强制推行，个人崇拜的猖獗，却不仅把俄罗斯文学本身带入了一个暗淡的低谷，而且给中国文学的发展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成为最终导致中国文学在一个长时期内出现停滞的外因之一。人们终于不得不承认：中国新文学既深受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滋养，又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饱受其极左化之害，从指导思想、理论批评到创作实践和读者接受等各个层面，概莫能外。清理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成为总结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历史经验的又一重要侧面。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所出现的以回归、复苏和重评为特征的种种文学现象，无疑是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最难以忘却的接受体验之一。人们记忆与印象中的旧有文学史图像被刷新了；一些声名显赫的文坛要人渐渐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光环和荣耀；许多陌生的作家、诗人的名字连同他们的作品纷纷破土而出，以其思想力量和美学风范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长时期以来被认做天经地义的文学观念以及关于它们的连篇累牍的阐释，遭遇到怀疑、否定和抛弃。在中国文学界和读者面前出现的，既是俄罗斯文学本身的一个新阶段，也是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俄罗斯文学、特别是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新时代。于是，重识经典、重评作家、重构文学史，一时间便成为研究者们经常性话

题。白银时代文学、俄罗斯域外文学、在苏联存在的 70 余年中的不同时期遭到批判和封闭的大批作品，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名噪一时的“开放体系”却已风光不再；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和巴赫金的诗学思想等在内的一度被忽略、被遗忘的理论流脉上升到文学的地表，如此等等，于是，中国读者心目中的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面貌便悄然发生了变化。“20 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广泛使用，加上苏联解体的历史真实，使得“苏联文学”这一原有概念面临着被逐渐淡忘的命运。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的“苏联文学”，即便历来人们对它的评说千差万别，对这一概念之内涵的解释也各有不同，但它的价值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国内学界曾围绕上述话题展开过多次有意义的学术讨论。

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文学与文化对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同样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历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著述与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哲学、艺术乃至宗教与伦理的广泛渗透。俄罗斯知识界在研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形象”。其中，俄国宗教哲学家、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弗·索洛维约夫对中国和欧洲文化的比较考察，高尔基笔下的“东方”与中国形象，从“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等诗人对中国诗歌文化的理解与接纳，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对中国文学的描述与阐释，都显示出俄罗斯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各具特色的解读。这些解读不仅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史册，而且能以其特有的“旁观者清”的视角，启迪我们进一步认识自身的文学与文化。

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还在继续发展之中，也必然拥有广阔的前景。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时髦”话题，但毫无疑问却将继续成为整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研

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自从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以至中国文学无论是反顾自己走过的路途，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确认自身的地位、成就和意义，还是更新自己的观念，调整自己的思路，规划未来的蓝图，几乎都要把俄罗斯文学作为一种基本参照，在与这一文学的比较和对话中寻得支持、激励、启示或借鉴。未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将继续呈现上述特点。相信将会有更具活力的学者对中俄文学关系进行更全面的梳理、考察和辨析，为描绘出中外文学关系的完整历史图景，为推动中国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中的进一步创新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 录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	王向远 1
自 序	1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1
当前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4
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几点思考	30
关于中俄文学关系的对话	41
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多元取向	48
俄罗斯文学精神与中国新文学总体格局的形成	65
关于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反思	79
“苏联文学”：内涵、价值及其他	
——“苏联文学再回首”笔谈	88
百年俄苏文论在中国的历史回望与文化思考	95
中国文学接受 20 世纪俄国文论的回顾与沉思	111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理论行程	121
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	161
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接受	174
巴赫金的诗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流布	187

周扬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	202
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	221
新中国 60 年高尔基小说研究的历史考察	234
高尔基之谜：“破解”还是曲解？ ——《倒转“红轮”》第二章读后质疑	25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的接受	280
帕斯捷尔纳克与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关联	298
弗·索洛维约夫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考察	313
高尔基笔下的“东方”与中国	336
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	349
巴赫金对中国文学的描述	361
[附]	
与俄罗斯文学的相遇与相守 ——汪介之教授访谈录	373
后 记	385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①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议论颇多。在全国性的本学科教学研讨会或校际高层次座谈会上，一些学者就“世界文学”学科是否应当存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是否应当合并、“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议论，也引起了笔者对本学科设置的由来、合理性和前景的思考。现在，笔者不揣浅陋，也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期望就正于同行专家学者。

“世界文学”：何去何从？

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名称，特别是其中的“世界文学”，有些学者提出非议。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取消世界文学专业，一律改称“外国文学”，并由外语系教师来承担其教学任务。于是，世界文学学科便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歌德在1827年与爱克曼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来的。后来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解释道：这个名称“似乎含有应该去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个意思”。但他们紧接着又说，“其实歌德并没有这样想。他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

^① 本文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

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韦勒克和沃伦还指出：“‘世界文学’往往有第三种意思。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歌德，他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同义词，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选。”^①

或许是由于认同了韦勒克等对“世界文学”的第二种解释，有学者指出：“世界文学”在今天，“还仅仅是先哲们对人类理想社会幻想中的一个梦”，既然是一个梦，怎么可以拿它来作为中国大学中的一个学科呢？

事实上，在我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 1997 年以前，作为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学科名称之一的“世界文学”，其内涵接近于上述韦勒克等的第一种解释，而并不是把某种伟大的理想或幻想拿来当作学科的名称。不过，这一学科通常不把中国文学作为自己教学和研究的对象，尽管从字面上看，“世界文学”无疑应当包括中国文学。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刊物，一般不刊登中国的文学作品；我国历史学科中的“世界史”专业，通常也不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教学和研究的对象。这样看来，“世界文学”其实就是外国文学。它主要研究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史的一般进程，注重考察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的交嬗演变、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力求探明各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如果说到作为一门课程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那么它在我国高校中文系的开设，则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以前。早在 1917 年，周作人就在北京大学文科、随后又在中国文学系以中文讲授欧洲文学史。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从 1928 年起，就提出“一方面注重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第 43—44 页。

于研究中国各体的文学，一方面也注重于研究外国文学各体的研究”。1932 年秋朱自清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样特别重视外国文学，“西洋文学史”一直被列为该系的必修课。1946 年清华大学复员后，朱自清续任中文系主任，“世界文学史”课程由中文系开设，以中文讲授，并让学生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中文译本^①。从 50 年代起，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等绝大部分综合性大学以及几乎所有的师范大学的中文系，都先后设立了外国文学教研室。这些教研室的教师承担着给中文系本科学生讲授外国文学的任务。由于“文革”前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不健全，当时中文系外国文学师资的来源，除了已有的老一代学者外，主要还有两条渠道：其一，教育主管部门从中文系选拔一部分有较好的外国文学素养和一定外语水平的教师或本科毕业生，到外语院系脱产学习几年外语，学完后回原系科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其二，从外文系教师中抽调一部分文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到中文系任教。这三部分人构成“文革”前和“文革”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很有造诣和影响的知名学者，如赵瑞蕻、朱维之、张月超、朱雯、许汝祉、王智量等。他们的外国文学教学、翻译和研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

70 年代末期以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制度开始逐步走向健全。如同中文系各学科都要通过研究生制度培养自己的师资队伍一样，外国文学学科也面临着这一任务。于是，从 80 年代初期起，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我国高校便开始有了作为二级学科的“世界文学”硕士学位点（1980 年第一批正式建点的，有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从那

^①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57、446 页。